

# 博物学视域下柯勒律治有机整体自然书写

郭姝敏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要

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植根于博物学观察, 是柯勒律治生命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章旨在从博物学视角分析柯勒律治诗歌中的“物”书写, 呈现其博物实践与自然意象, 解释万物相互联系、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不仅是柯勒律治博物学实践的升华, 更是其“有机统一”生命哲学的体现。通过对其诗歌文本中鸟类、植物、气象等具体自然物的分析, 揭示了这些意象不仅是博物学知识的诗学转化, 更是其哲学观念的隐喻。

## 关键词

柯勒律治, 博物学, 有机整体自然书写

# Coleridge's Writing of Organic Unity of Na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Shumin 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April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Coleridge'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rooted in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his philosophy of lif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epiction of "objects" in Coleridge'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presenting his naturalist practices and imagery of nature, and explaining hi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characterized by interconnectedness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all things. Coleridge'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reflects the sublimation of his naturalist practices into a philosophy of "organic unit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pecific

natural objects such as birds, plants, and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in his poetic text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se images are not only poetic transformations of naturalist knowledge but also metaphors for his philosophical ideas.

## Keywords

Coleridge, Natural History, Organic-Holistic Nature Writ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柯勒律治是浪漫主义“湖畔派”代表诗人之一，其一生不仅在诗歌领域成就卓著，还提出了独特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在《生命理论》中，他集中阐述道：自然是一个复杂、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一方面，自然界中的个体生命具有内部与功能的完整性，是独立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个体反映整体，整体由部分构成，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存，由个体生命所组成的自然界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种观念下，柯勒律治对自然万物充满共情与尊重，坚信人、动物与植物能够和谐共处，自然绝非机械的聚合，而是有机交融、共生共荣的整体[1]。

柯勒律治的诗歌从细微的草木虫鱼到宏阔的天地万象，无不体现其对自然界的好奇、精确的观察以及对造物原则的赞叹。他的自然书写不仅包含对生物形态的精准描摹，还将非生命物纳入万物互联的共生网络。在他的视野中，岩石、水体、大气、光影乃至气候现象都不是孤立的物理存在，而是与生命世界持续互动、共同参与自然整体运作的能动要素；非生命物绝非沉默的背景，而是承载自然意志、维系万物互联的关键枢纽。

浪漫主义时期被视为西方自然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文学创作与蓬勃兴起的博物学文化深度交融。阿什顿·尼科尔斯(Ashton Nichols)在《浪漫博物学：华兹华斯、达尔文与他者》中搜集了1750~1859年间与博物学相关的散文与诗歌，将这一时期称为“浪漫博物学”时期[2]。博物学是一门研究、观察、分类自然事物，并认知自然系统性、整体性与复杂性的古老学问，涵盖知识、情感与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刘华杰在比较汇通西方与中华博物文化传统后强调，博物文化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文情感的唤醒、对生态危机的克服、对现代性的纠偏。他提出新博物精神的内涵是：“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人类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它导向“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体悟“自然之整体性和玄妙”[3]。

近年来，国内以博物学作为独立批评视角的生态批评研究渐成趋势。吴靓媛(2018)[4]关注多萝西·华兹华斯自然书写的审美特质，揭示其博物自然散文静谧质朴而精准的独特文风。艾莲与郭晓燕(2018)[5]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湖畔派”诗人的博物书写传统，论证浪漫派诗人经历了接受博物书写并将博物知识融入诗歌创作的过程，指出怀特、达尔文等博物学家的著述深刻影响了湖畔诗人的语言风格与自然认知方式。这些研究共同奠定了博物学生态批评的学科地位，其与生态批评物质转向的呼应，为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开辟了新视野。

本文认为，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哲学植根于他对自然万物的博物观察。麦克库希克在《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6]中指出：“柯勒律治在湖区旅行时记录下的笔记表明，他正在通过有机形式

的概念，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更具体的认识，去理解人类造物与其自然环境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的多种方式。”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在他以科学且精确的视角观察生命形态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阐释。诗人凭借其博物学的视野、有机的哲学与诗意的书写，构建了一种融合情感、科学与伦理的自然观。他不仅以博物学的姿态深入观察自然，更上升至以整体性思维理解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供了一种超越机械论、超越传统博物哲学的生态思考。

## 2. 柯勒律治植物有机性的博物书写

在对植物的书写中，柯勒律治融合了科学精确性与诗性感悟。他认为有机生命具有内在的生发性，这一哲学认识扎根于其深厚的植物学知识与细致观察。为了阐释植物的生命属性，他热衷于观察植物生长与植物形态，对植物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细致观察，对茎、叶、花等器官的功能进行精确描述。在柯勒律治的诗歌中，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独立的有机生命，植物既具有内在统一性，也与自然界进行着能量互动，是具有能动性的生命个体。这种对植物有机整体性的博物书写，不仅强化了其自然观的科学基础，更体现了他对林奈分类式静态博物学的超越，柯勒律治强调用有机整体的动态联系思维看待个体生命的内在统一性。

移居昆托克山后，在华兹华斯的影响下，他的诗歌创作与笔记记录都呈现出对自然书写的鲜明转向。这一时期的柯勒律治在笔记中呈现了对各种植物种类的兴趣。

“据我观察，春日花卉在白日阳光下最为明艳，而夏秋之花则在灯光或烛光下更显韵味。此刻我面前有一盆樱花、西洋樱草、重瓣紫罗兰、长春蔓与桂竹香，但它们看起来多么暗淡朦胧！唯独猩红的银莲花是个例外——取三四朵银莲，配以花瓶中其余的白花枝，再加一两枝长春蔓(因其墨绿叶片、青翠茎秆与柔美优雅的姿态)，无论在日光还是烛光下，都能构成可爱的一丛” [7]。

这是一种典型的博物学家式的眼光，林奈分类法讲究的对动植物分类命名正是 18 世纪英国民间非常流行的消遣和学习。柯勒律治像博物学家一样细致地观察樱花、西洋樱草、重瓣紫罗兰、长春蔓与桂竹香。植物在光影下的勃勃生机让柯勒律治的内心响起了对大自然生命之美的赞叹之歌。

柯勒律治没有止步于欣赏植物的外在美，还注意到了植物各个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其在一则笔记中讲述了一次与小儿子一边交谈一边观察一枝香橙树的经历。他指出香橙花枝“有四片翠绿的老叶子点缀其中”，以“三枝玫瑰花枝”为装扮，显得“非常可爱”。除了香橙花的可爱形态，柯勒律治又注意到了香橙花“花朵如此繁密……哪怕其中四分之一(花朵)结成果实(按自然大小)，都足以将枝条压断”。面对心中香橙花油然而生的担忧，柯勒律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不算失衡，也不是浪费，这正是造物之美的恣意挥洒”。其作为观察者认为，或许“(自然)借此极大增加了适量花朵结果的可能性”。此外，他还描述了“蜜蜂如何成群萦绕、嗡鸣不止！还有多少微小的、永不褪色的昆虫共享此果实盛宴” [7]。柯勒律治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视角，对自然过程充满好奇与惊叹，他不以人类的标准评判植物的生长，而是认为植物的生命是一个有机整体，植物的形态与生命过程正是自然造物原则的体现，在生命形式面前，人类是虔诚的观察者、总结者、学习者。

这种基于细致观察的博物学兴趣，同样深刻地塑造了他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柯勒律治将博物观察与诗意结合，浪漫地呈现了植物之爱、植物之美和植物疗愈人类心灵的能力。在《这棵椴树凉亭我的牢房》一诗中，首先，植物本身的生命活动预示着个体的有机性：椴树的叶子“沾染了夕阳的斑驳色彩”闪耀着生命的光，暗示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其次，植物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栖息地。“野蜂通过花朵采蜜授粉”在豆花间的嗡鸣。“孤独的野蜂”这一意象与诗人被同伴“遗落”的处境相互呼应形成镜像。诗中的椴树和豆花不仅是个体的植物，更作为中介者为蜂群提供生存资源。最后，植物还为诗人提供了身体上的凉爽庇护所和精神上的疗养，让诗人的精神上升到了崇高境地。椴树的生命活力调节了诗人的情绪，

野蜂通过授粉维持豆花繁衍。野蜂、豆花、椴树和诗人形成了物质与精神上互惠的生命联结和有机整体。

柯勒律治将他在德国所学到的生物学知识和有机体思想彻底融入到了理论探索中。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讨论了柯勒律治的植物隐喻，指出“在柯尔律治的批评著述中，很多说法都是字面意思指植物，但在深层意义中却暗喻艺术，这确实令人惊叹不已……只要他的隐喻的媒介物一旦复活，你就会看到一切批评对象都会不可思议地被扭曲而变成植物或植物的枝叶，在热带地区茂密生长”。“作者、人物、诗的类型、诗段、语词、韵律、逻辑变成了种子、树木、花朵、蓓蕾、果实、树皮和树液”[8]。柯勒律治在其自传《文学传记》中以植物的整一性比喻了艺术创作的有机整体原则：“华兹华斯的诗歌在整首诗的形式、风格和方式，以及特定诗句和时期的结构上，一种粗糙和尖锐与其中闪光的辞藻与画面相结合，让人联想到植物世界的种种：绚丽的花朵从坚硬而多刺的外壳中长出，精心培育其中丰富的果实”[9]。

柯勒律治将植物的博物观察上升到了万物互联共生的有机整体的哲学。在观察番红花成长的一则笔记中，柯勒律治的有机思想始于对植物的观察，但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经验层面，而是将对实物的观察经验上升为植物生长过程的生命哲学和其他人文批评的经验融合，印证了博物学由日常经验观察走向哲学思想的精髓。

### 3. 柯勒律治对动物的博物书写

同样，在动物意象的营造上，柯勒律治亦体现出博物精神的观察与整体性生态伦理。

在《致幼驴：其母被拴在附近》一诗中。柯勒律治看到了草地上被拴住的驴母子，诗人首先细致地描述了驴子的生活环境，对它们恶劣的生存环境感到不公，谴责了人类奴役动物的残酷行为。

难道是你哀婉的心灵难以承受？  
目睹你可怜的母亲被链条锁住？  
的确，她的命运着实令人同情！  
拴在一个木桩上活动范围很小，  
那里刚刚啃过的青草很难看到，  
周围诱人的绿色却是如此繁茂！

全诗以抑扬格五音步为主导，这一格律接近自然心跳的节奏，本应平稳行进，但柯勒律治在关键位置刻意打破这一韵律框架：开篇的疑问句以抑扬格起首，形成“先降后升”的语调波动，模仿了说话者因情感冲击而语塞的生理状态。这种节奏的“绊倒”与“中断”，在读者身体中制造出轻微的“不适感”。韵律的断裂使读者在阅读诗句时体会到某种不协调，从而切身感受到驴子被拴、觅食艰难的恶劣生存处境。

在柯勒律治的描写中，驴子不是低等的畜类，它们是人类的“兄弟”和“苦难的孩子”，赋予驴子以人类的称呼，把驴子的苦难暗示为人类的苦难，表达了动物与人类苦难的共通之处。因为人本质上也是动物，人类不能以专横的态度赋予动物苦难，动物的苦难是人类邪恶的化身。诗人同情动物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动物与人类一样能感知痛苦；二是动物的痛苦常由人类造成。马和驴等虽然被认为是畜力，但它们同人一样具有感知能力，人类应该尽量减轻或是避免施加在它们身上的痛苦。这种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对苦难的共情、对相互归属的愿景超越了物种界限，体现了深刻的动物伦理——作为相互依存的整体，所有生命都应被平等对待。柯勒律治谴责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呼吁人与自然建立尊重、平等与爱的关系。

自然科学在 19 世纪的突破性进展是人类引以为傲的“进步”，人类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自然是可以被人类认识、征服和利用的。而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则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表达质疑。在德国研习期间，柯勒律治深度吸收了康德、谢林的哲学。康德的理性哲学严格区分理性存在(人)与非理性存在(动

物),主张人对动物仅负“间接义务”,即善待动物是为防止人性堕落,而非承认动物内在价值。康德虽承认动物能感受痛苦,但仅将其作为人性教化的工具。柯勒律治则赋予动物痛苦以平等的地位,将生命的伦理道德从人类社会扩展至动物。

除了对驴子苦难的书写,柯勒律治诗歌中对鸟儿鸣叫声音也情有独钟。这种情感在18世纪盛行制作动物标本的年代显得尤为宝贵。在一则笔记中,柯勒律治曾表达了对笼中鸟的同情:

“但在所有被关起来的鸟里,我最看不下去的莫过于笼中夜莺、困雀之燕、囚樊之杜鹃……这娇憨昂首转眸的小精灵,偏偏将我们的厨房,选作了它心甘情愿的囚笼”[7]。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提出了“存在之链”的生命发展理念,认为非生命体、植物到动物,生物界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类位于存在链条的较高位置[10]。在“伟大的存在链”中,动物的声音被视为低于人类语言的“自然信号”,不具备理性意义。然而,在诗《夜莺》中,柯勒律治以生物学家的视角,细致地描述了夜莺的歌声和栖息环境。在一个明亮的月夜,树丛“半舒半卷着凝露的细叶”,夜莺栖在枝头,有着“又圆又亮”、“闪烁”的眼睛,彼此“逗引附和”、“欢乐歌唱”、瞬间“琴瑟般的和声,激荡着天地”。柯勒律治在描述夜莺歌声时,密集使用了爆破音与摩擦音的交织,以及长短元音的交替变化,在声音层面模仿了鸟鸣的“应答”结构。在描绘夜莺歌声的段落,诗行长度出现明显的长短变化,句法结构也变得更加断裂与跳跃。诗的节奏在“模仿”夜莺歌声的节奏,从而使读者在聆听诗歌声音的过程中,将夜莺的声音“写入”自身的身体经验。

这一诗艺选择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柯勒律治认为,自然生命本应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不是被困在笼中,供人观赏的玩物,只有回归自然,世间万物才会找到最纯洁的生活状态。夜莺不是被囚禁、被人类观赏的动物,而是生活在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生灵,人在夜莺美妙歌声的引领下向往自然的神秘。夜莺是远离尘嚣的,是超脱罪的圣洁生灵。柯勒律治让夜莺的歌声“激荡着天地”,让聆听者“心神澄澈”——诗中呈现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而是人与非人生命在声音中的相互渗透与交融。

柯勒律治对动物的书写,彻底超越了同时代博物学那种将生命视为静态标本进行分类与收集的机械范式。他的目光穿透了物种目录的表层,不仅精准地锚定于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还凝视并感知动物生命本身的脆弱与苦难。在他的诗行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不再是理性主体与麻木客体之间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也超越了“理智与非理智”的冰冷二分,而是一种饱含无限同情的、对非人类生命的深度共情。

#### 4. 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和生态环境的博物书写

在柯勒律治的自然书写中,除了自然中的动物与植物,非生命物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柯勒律治笔记诗中的非生命物不是机械的、与人无关的存在,而是充满活力、自成一体、相互联系的有机的世界。

柯勒律治搬到湖区之后,热衷于与华兹华斯兄妹在昆托柯山远足。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写下了许多日记、游记,细致地记录下了漫游中所见的草木鸟兽。他们不留恋工业革命中城市的繁华,而是漫步于山间乡野中,漫游于萨默塞特郡秀美的山丘间,时而登临昆托克山之巅,时而穿行于倾斜的峡谷之中。他们观察自然万物的方式也受到了博物学的影响。在他笔下的风景中,有两类景致尤为吸引他:一种是近在眼前、纤毫毕现的细微之美,二是从山顶俯瞰时,山坡、山谷与海洋交织而成的壮阔全景。

柯勒律治对天气变化、云朵形态、静谧泉水、山中岩石等非生命物充满兴趣,在博物学“观物”进而“感物”,体会自然的整一之美。比如,柯勒律治在笔记中写到了对岩石的观察:“岩石和石头呈现出至关重要的相似性,生命本身似乎因此放弃了它的不安,在它自己的本质中预示着无限的安息,并仿佛与不动性相容”。他赞叹彩虹,“看那天边的彩虹,它在破碎的云层间神奇地保持着弧形的姿态——这里

突出一块，那里凹进一块，却依然是一道完整的虹。仿佛有人将几段彩色丝带按一定间距摆放，只为让弓形轮廓在印象中留存。”湖区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光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薄翼的蜂鸟身披微光之雾，在花铃与萼杯间迅捷不息地飞舞——那是片‘至福之地’，而熊蜂尚在其间笨拙劳作；雄鹰与云层齐平，自身化作一抹云痕，自山巅至山巅凝望山谷全景。瀑布向谷底倾泻飞沫，最丰盈的雪白泡沫如羊毛般轻轻落在岸边的花丛上，或是下方更宁静池塘中的睡莲叶间” [7]。

在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自然事物的有机统一，也带来了人类感官上的统一，大自然的整一(Oneness)之美给人一种感官上的整一审美。“啊！岂止明月，这幽邃的苍穹本身！月亮是一种意象；而深邃的碧空，在一切视觉印象中，最近乎一种心绪。它不仅是景象，更是一种感悟，或者说，它是视觉与情愫消融交汇的完整体现。”“啊，那天空！那温柔、湛蓝、宏伟的穹顶，安卧于群山之上，或是铺展在如坚实海面般的平野——这‘万物归一’中蕴藏着何等令人敬畏的无限！我从未见过崇高与优美如此完美的融合，它们同时被感知——虽然通过不同的心灵官能，而每一种官能又都似乎预先被调协，得以接纳来自另一官能特质的影响” [7]。

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的观察不止步于经验，更上升到了诗歌的隐喻中，象征着大自然的神秘。在柯勒律治的诗歌中，非生命物书写包罗万象。自然中非生命物(如天空、海洋)和自然现象(如大气)，在柯勒律治的一些诗歌中都占据了很大篇幅。这种处理的最佳例证见于《古舟子咏》。诗中的自然描写并非核心兴趣所在，而是作为人性与超自然元素的背景呈现。这些描写涵盖范围极广，几乎包罗了航海途中可能经历的一切自然景象：既有热带酷热的描绘、温带温和气候的刻画，也有极地严寒的呈现。以下诗句生动而精确地展现了这三种气候状态：其一是热带景象——

赤日炎炎悬中天，  
灼灼铜穹如火燃。

午时日轮凌桅顶，  
不盈满月照孤帆。

其二是温带气候图景——

惠风吹拂，白浪飞溅；  
航迹逶迤，自在蜿蜒；

其三是极地严寒之景——

忽有寒雾夹雪降，  
奇冷彻骨透脊梁。

巍巍冰峰浮海过，  
翠色莹莹如绿璋。

这一描述讲述了水手航行至不同水域的气象场景。天气不好，水手就会感到炎热或寒冷，月光不亮，航行的视野就会受限。射杀信天翁的水手受到了极端天气的惩罚，寸步难行，不得不在船上自我救赎。柯勒律治的非生命物书写体现出人在自然中的渺小，人类不能决定所处的生存环境，而是受到生存环境的限制。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尊重美好生灵(信天翁)的水手迎来的不是征服的果实，而是灭顶的绝境。人类意图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类活动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古舟子咏》就说明了人类不尊重自然所受的惩罚——“四周都是水，但没有一滴可以喝”。诗中所描述的生态危机与柯勒律治笔记中观察到的平静自然截然相反，体现了柯勒律治将整个自然视为有生命、有灵性的整体。

由此可见，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的博物书写，远非对气象、地理等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其有机整体自然观最为精微与宏大的体现。从笔记中凝视岩石的“安息”与彩虹的“完整”，到诗篇里感悟苍穹的“整一”与海洋的“无限”，柯勒律治笔下的非生命物现象，虽然不是诗歌的主体叙事，但是被赋予了精

准的观察与灵性。它们的“死寂”或“翻腾”主宰着航船的命运与船员的生死，构成了一张惩戒与救赎的生态网络。

在《忽必烈汗》中，“圣河阿尔佛”流经“深不可测的岩洞”与“无光之海”展示了自然运动的伟力和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渗透、对立统一的整体性。这种书写超越了静态的、分类学的传统博物学，转向一种动态的自然哲学。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处于永恒运动、相互依存的整体联系中，自然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密有机整体。这深刻体现了刘华杰所阐释的“新博物精神”，把自然视为密切联系的机体，并在此认知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的情感交融与和谐共生。

柯勒律治的非生命物书写兼具审美意象与自然伦理的隐喻，自然的“整一之美”不仅是感官与心灵愉悦的源泉，更是维系所有存在者(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与非生命)和谐共存的基础。他的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博物”，最终并非征服或归类万物，而是学习以谦卑与互联的目光，去重述我们与脚下岩石、头顶星空以及其间万般气象不可分割的自然万物。

## 5. 结论

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植根于他的博物兴趣与博物观察，其对自然中植物、动物和非生命物的有机性观察、同情与赞美奠定了将自然万物列为诗歌中生命叙事的基础。他不仅以诗人之眼捕捉自然万物的形态，更将主体的敬畏、共情与伦理反思深刻渗透其中。这种由观察至共情、由共情至整合的思想，使他的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绘，成为承载万物有灵且相互联结的生命叙事的基础。从哲学层面的博物学来看，既理解自然的统一性，也要尊重每种生命在自然统一体中的独特价值。自然不再是被分割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机统一、不断变化的整体。

## 参考文献

- [1] Coleridge, S.T. (1848) Hints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Life. John Churchill. <https://doi.org/10.5962/bhl.title.29000>
- [2] Nichols, A. (2004) Romantic Natural Histories: William Wordsworth, Charles Darwin, and Other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3] 刘华杰. 博物学论纲[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1, 33(6): 2-11.
- [4] 吴靓媛. 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 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的多萝西·华兹华斯创作[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2): 188-195.
- [5] 艾莲, 郭晓燕. 湖畔派诗人: 从博物学知识到自然写作实践[J]. 文艺争鸣, 2018(11): 169-176.
- [6] Mckusick, J.C. (2000) Green Writing: Romanticism and Ecology. St. Martin's Press. <https://doi.org/10.1057/9780312299514>
- [7] Merton, C. and Kathleen, C. (2003)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Routledge.
- [8]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郗稚牛, 张照进, 童庆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9] Coleridge, S.T. (1907) Biographia Litera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亚里士多德. 动物志[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